



昨夜星辰昨夜风

陈漱渝

怀人散文

陈漱渝 ◇ 著

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悲欣人生回响久久，

轻轻叩动他们的生命之扉；

胡适、李雾野、萧军、苏雪林、

台静农、林海音、李敖、柏杨……

北方文艺出版社

昨夜星辰昨夜风



陈漱渝怀人散文

陈漱渝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漱渝怀人散文 / 陈漱渝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317-3737-7

I. ①昨…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7920 号

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漱渝怀人散文

Zuoye Xingchen Zuoye Feng Chen Shuyu Huairen Sanwen

作 者 / 陈漱渝

责任编辑 / 王 爽 张雪菲

装帧设计 / 锦色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32

字 数 / 127 千

印 张 / 8.5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737-7

定 价 / 36.00 元

目 录

- 001 飘零的落叶
- 034 春风化雨忆恩师
- 051 精神犹在海天张
- 067 数通书简，一席交谈
- 079 白云原自一身轻
- 092 经磨历劫，倔强抗争
- 102 绝学垂后世，德范昭替人
- 112 我在花篮里插上了百合
- 123 重展遗简忆恩师
- 135 学者风姿战士魂
- 147 长忆我心是你的情

- 159 渴望温情
- 171 丹心白发一老翁
- 187 昨夜星辰昨夜风
- 194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 204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 213 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
- 222 人生难得是欢聚
- 233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 245 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
- 259 他的裸足与大地亲吻

飘零的落叶

——胡适晚年在海外

台北南港，有一处依天然地形设计的墓园。这里曲径回旋，浓荫蔽日，松柏簇拥，碧草如茵。墓穴内那具用香杉木制成的深紫色的柩木重达一吨，里面平静而安详地长眠着一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个获得 30 余个博士荣衔的人，身穿蓝色长袍和黑马褂，脚着布寿鞋。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据说，他出丧那天，有 100 余个团体参加公祭，自发送殡者多达 30 万人。不少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开始，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自 1936 年鲁迅去世之后，没有其他文化人享受过这种殊荣。

回顾他 71 年的生涯，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在读

者的印象中，他并不是用白话文做大众传播工具的第一人，但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他并不是第一个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人，甚至可以说他缺乏作家应有的禀赋，但他却是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话剧创作的开山者。他对《红楼梦》的批评实在不算高明，比如他指责这部小说没有一个 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就毫不符合现代小说非情节化的观念，但他却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因为有了他，《红楼梦》这部作品才多了“著者曹雪芹”这五个字。他崇尚西方，曾将“全盘西化”的口号修正为“充分世界化”，但他反对基督教，批抽象派、印象派，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粹”与“国渣”区别开来。他留居美国二十余年，从未申请“绿卡”，从不以“美国人”自居。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和大官僚的脸皮，却执意要以“无党无偏”的姿态做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到头来，蒋介石当面批评他“不相信我们政府”。1956年12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甚至发出“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将他斥为“思想上的敌人”。

我绕了偌大弯子才直接点明的这位历史人物就是胡

适。由于他在大陆的情况为人们所熟知，故本文侧重介绍他晚年在海外的情况。

胡适是1958年4月8日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的，此前他曾四次到过台湾。

第一次是1893年3月2日至1895年2月随父母在台湾。其父胡传（字铁花）曾先后出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和台东直隶州知州，因此牙牙学语的胡适曾在台南住了九个月零一天，在台东住了一年零十八天。这两年的生活给胡适的影响，是使他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学会了两句台湾话：一句是“呷饭”，即吃饭；另一句是“呷米”，即喝粥。因为在台湾的这一段经历，胡适把台湾视为他的第二故乡，他还自称是“半个台湾人”。

第二次赴台是1949年3月，胡适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夕接受了蒋介石委派，准备去美国。同月22日，他到台湾安置家属，停留了一周，然后回上海，搭威尔逊总统轮赴美。在台湾的胡适纪念馆，保存了一封蒋介石致胡适的密信，他向胡适交代了此行的任务：“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

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按：指顾维钧），多加功夫为盼。”这封密信写于1949年5月28日正午，即上海解放的第二日。

胡适执行此项使命的情况不知其详，我们从有关资料了解到，他曾于同年5月初两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又曾于同年12月9日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演：《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但是，胡适在美国的上述活动处处碰壁，使他精神上感到十分苦闷。

胡适在美国寓居在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在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后租赁的一所破烂公寓。这种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他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陷入绝境。他那位不识字的小脚太太只会夜以继日地打牌。为了避免坐吃山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只好应普林斯顿大学之聘，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做了一名管理中文图书的小职员。他常手捧纸袋到自选市场采购食物，也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

在胡适生命中这段最灰暗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对

他进行了第一次争取工作。1949年4月29日，即胡适抵达纽约后的第三天，胡适的老友、著名史学家陈垣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很诚挚地”劝告胡适“正视现实”“翻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这封信始刊于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后被香港左派报纸转载，又被译成英文在海外散发。

然而，陈垣的规劝未能改变胡适的立场。1950年1月9日，胡适作《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信〉》，刊登于《自由中国》第2卷第3期。他从文字方面分析，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陈垣的姓名假造的；又从内容方面分析，找到了一处错漏——将胡适给陈垣写信的日期误为陈垣收信的日期。

“从来不写白话文”的陈垣发表的这封白话书信是否经由他人代笔或润饰，局外人难以准确判断。不过信中表述的一些感受和观点，看来的确反映了陈垣老先生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思想状况，发表前也不可能不征求他本人的同意。这从陈垣1948年底拒绝飞离北京以及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表现可以得到间接印证。陈垣致胡适的这封信并非一封单纯的私人信札。它之所

以得以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显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胡适以及胡适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

胡适第三次台湾之旅是从1952年11月19日至1953年1月17日。此次旅台，是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之邀请讲学，主要内容为“治学方法”“杜威哲学”；此外，他还就时事政治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这些讲词，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辑成《胡适言论集》，由华国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学术及治学之部》，下编为《时事问题及其他》。

讲演之余，胡适凭吊了他儿时在台湾的旧居。1952年12月26日，胡适参观了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的永福国民学校。校内有一座做仓库用的朴陋的老楼，是原台南“巡道署”的唯一遗址，还不到两岁的胡适就是住在这座楼房的附近。参观照相之后，胡适还手植了一棵榕树，并书写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及“游子归来”等题词。次日，他又到台东重温了他儿时那模糊的旧梦。胡适在台东的故居在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但他儿时的住所已变成荒丘。在台东忠烈祠前，胡适又手植了两株樟树。

胡适第四次台湾之旅是从1954年2月18日至4月5日。当时台湾要召开“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当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将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台湾《中央日报》1954年2月19日）但是，胡适却拥戴蒋介石任“总统”，并亲自把“总统当选证书”送到蒋介石手上。胡适此次在台北住了46天半。返回美国前，他在机场答记者问，期望在台湾实行“无条件的自由”。

胡适鼓吹“无条件的自由”的理由是：“无条件的自由权利并没有多大危险。对人民自由的保障，宁可失之于周全。政府是有权力的，一个公民是无权力的；政府是万能的，一个公民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无权无告的小民对有权万能的政府，人民多得一点保障是没有大危险的。人民的权利最容易为有力量的政府所侵犯，所以对人民的保障宁可是无条件的周全。”（《美国的民

主政治》，《大陆杂志》第8卷第6期，1954年3月31日）然而，人类社会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只要存在不同利益的集团或阶层，实现“无条件自由”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胡适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能不承认，美国人的自由“有时也要受某种的限制，那就是各州的‘警察权’，因为警察权是宪法保留给各州的”。

1954年秋冬之季，胡适在海外面临了两面夹击的处境。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致函，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同年12月28日，《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实际负责人雷震因屡次触国民党当局之忌，被蒋介石开除了党籍。胡适是雷震的好友，又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名义发行人。胡适不仅参与了为该刊定名，而且该刊每期都刊登的“宗旨四条”就是胡适1949年4月由上海赴美国途中在船上写的。胡适支持该刊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反共：把大陆的政治描绘成“铁幕恐怖”下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的“极权政治”，而把台湾国民党政权作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但从1951年6月开始，这一刊物却因干预台湾的政治和

经济而处于逆境。1952年夏，《自由中国》刊登过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政府机关或机关人员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文章刊出后，台湾军政当局下达了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因被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扣押，未能执行。当时，胡适对这篇社论表示了百分之百的赞成，并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表示抗议，认为“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所以国民党当局此次对雷震的处置也是对胡适的一种间接警告。

1955年4月，胡适在《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发表了一篇读书札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文中摘抄了宋朝范仲淹《灵乌赋》的一大段原文：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胡适转引这篇赋，显然是想以托庇于主人常想报恩的乌鸦自比，向蒋介石表明心迹。上面几句引文的大意

是：“知我者说我是想逢凶化吉，不知我者骂我是不祥的动物。报告了主人，我自身常遭他痛恨而受害；不报告呢，主人就会因疏于预防或驱避而遭殃。但是主人之恩不可忘，所以我虽冒死也必向他报告，庶几他可预防。”

然而，自由主义不仅是跟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而且它又反对极权政治，因此，跟封建法西斯主义也是格格不入的。尽管胡适再三向蒋介石政权表达他愿做“诤臣”“诤友”的愿望，但仍无法改变他“忠而获咎”的厄运。这一时期，胡适在美国深居简出，跟美国的汉学家也很少交往。1955年12月19日，他在致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我这几年所以故意不教书，也不热心向人要教书讲演的机会，实在是因为一种避嫌的心理。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我总有点神经过敏的感觉，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切不可同他们抢饭吃。”

在居美赋闲的日子里，胡适对《水经注》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考证，又为他的友人丁文江撰写了一部12万字的传记。对于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他通过多种渠

道收集来逐篇阅读，看了不止 200 万字的资料。胡适想解开一个“大谜”：三十多年之中，他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他想撰写一篇题为《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解开这个“大谜”，不料写下去他才明白这个问题很简单，所以这篇文章他至死也没有写成，只留下了一些残稿。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就在中国大陆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胡适的工作。出面规劝胡适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因主编《涛声周刊》而被称为“乌鸦文人”的曹聚仁，另一位是胡适的老友周鲠生。

1956 年，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记者的双重身份回到阔别六年的中国大陆，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回到香港后，他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在北京拜访老文化人张东荪、周作人、梁漱溟的情况，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并表示他愿意陪胡适巡行各地。信中说：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者，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